

语言接触与西宁方言的并列和伴随

——兼论伴随和工具格标记“俩”的来源*

王双成

[提要] 并列是语言中常见的编码手段,西宁方言的并列从形式、语义类型来看,既有汉语的“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特别是并列和伴随的关系,并列标记、伴随标记的使用特点以及伴随标记进一步语法化为工具格标记的特点及其来源,都和周边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密切相关。其中伴随、工具格标记“俩”来自汉语“两个”,但其使用、语法化特点同阿尔泰语的影响相关,是长期接触而形成的区域特征。

[关键词] 西宁方言 并列和伴随 工具格 “俩”的语法化 语言接触

并列几乎是每个语言都会采用的编码手段,也是一种最为简单的组配方式,一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义地位相当的同语类成分通过显性(overt)或隐性/零形式(covert)连接件(coordinator)而构成的复合体,并列复合体的句法范畴一般与单个组成成分一致”(杨萌萌、胡建华 2017)。马清华(2004:18)把并列分为:复合词内部的语素并列(简称“语素并列”)、词跟词的并列(简称“词并列”)、短语跟短语的并列(简称“语并列”)、子句跟子句的并列(简称“子句并列”)。

本文主要讨论西宁方言并列的形式语义类型以及西宁方言并列和伴随标记的特点、来源、类型学意义等相关问题。

一 西宁方言的并列

(一) 并列的类型

1. 从形式上看,西宁方言的并列可以分为无标记并列、有标记并列两类。无标记并列多为复合词,是由两个(或多个)具有并列关系的词或语素组成,构成并列的这几个词或语素往往在意义上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像下面的“好歹”、“大大妈妈”:

(1) 这个娃娃好歹不知道(这个孩子不知道好歹)。

(2) 大大妈妈哈好好儿心疼的要咧(要好好心疼爸爸和妈妈)。

西宁方言的并列标记有“带”、“嘛”等,功能各有分工。例如:

* 本研究得到上海师范大学“比较语言学与汉语国际传播”创新团队支持。本文先后提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语言类型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贵阳 2018.10.26-29)、“《民族语文》创刊4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北京 2019.10.11-13)交流。

(3) 袜子带鞋哈收拾掉(把袜子和鞋收拾掉)。

(4) 面片嘛拉面呀,到底吃啥咧(面片还是拉面,到底吃什么)?

多个并列项并列时,并列标记“带”通常加在前两个并列项之间,其他并列项之间有相应的停顿,并列标记“带”不能加在后两个并列项之间,例如:

(5) 小张带小刘、小李去了说(听说小张和小刘、小李去了)。

(6) 被套带床单、枕巾一挂洗掉(被套和床单、枕巾全都洗掉)。

并列标记“嘛”添加在多个并列项之间时,每个并列项之间都需要添加。例如:

(7) 面片嘛拉面嘛米饭呀(面片还是拉面,还是米饭)?

(8) 你买上个苹果嘛香蕉嘛橘子(你买点苹果或者香蕉或者橘子)。

从上面的特点可以看到,有多个并列项时,并列标记“带”和“嘛”的使用规则不同:“带”不允许加在每个并列项之间,只允许添加在最前面的两个并列项之间;“嘛”则不同,要求添加在每个并列项之间,不允许只添加在最前或最后。

2. 从语义类型来看,西宁方言主要有等立型并列、选择型并列、转折型并列。

2.1 等立型并列。由两个或多个并列项组成,这几个并列项之间没有主次之分,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变换前后位置不会有任何影响,西宁方言等立型并列的标记是“带”。例如:

(9) 小张带小刘哈我骂给了一顿(小张和小刘被我骂了一顿)。

2.2 选择型并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并列项组成但从多个并列项中选取一个或两个,标记为“嘛”。例如:

(10) 你买上个苹果嘛香蕉(你买一些苹果或香蕉)。

2.3 转折型并列。严格的转折型并列应该是 *but-coordinate*, 即只在后一个分句之前使用表示转折的连词的复句(刘丹青 2008:132), 按此标准, 西宁方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转折并列, 只有让步关系的复句, 这类复句在前一分句后面添加标记“们”, 语义上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虽然……但是”。例如:

(11) 小张的房子大们, 空荡荡的(小张的房子大, 但是空荡荡的)。

(12) 衣裳质量好们, 太贵了(衣服质量好, 但是太贵了)。

(二) 并列标记的句法位置及属性

就并列标记的位置而言, 西宁方言的“带”是前置词, “嘛”是后置词, 如果停顿, 分别在“带”的前面, “嘛”的后面。其标记位置可表示如下(*co*表示并列标记):

带: [A][*co* B] 嘛: [A *co*][B]

从句法属性看, 西宁方言表示选择的并列标记“嘛”的性质比较清楚, 是“连词”,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或”; 这里主要讨论一下并列标记“带”的性质, 因为“带”总是和伴随纠缠在一起, 到底是连词, 还是介词, 观点不一, 比如现代汉语的“和”, 根据杨萌萌、胡建华(2017)的分析, “和”在主语位置上应分析为介词而在宾语位置上表现为并列连词。

西宁方言的“带”在宾语位置上的性质也很清楚, 是典型的连词, 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可以得到结果:

(13) 我小张带小刘哈骂给了一顿(我骂了小张和小刘一顿)。

例(13) 宾语“小张带小刘”带有宾格标记“哈”, 所以句法属性没有任何疑问, 其中并列标记“带”也是典型的连词。如果并列项不止两个, 宾格标记“哈”通常加在最后一个并列项之后。例如:

(14) 我小张带小刘、小王哈骂给了一顿(我骂了小张和小刘、小王一顿)。

以上的例句还可以用“把”字结构表达,如例(15)介词“把”和“哥哥带兄弟”构成介宾短语,“带”的性质也没有任何疑问。例如:

(15) 我把小张带小刘骂给了一顿(我骂了小张带小刘一顿)。

在主语的位置上,我们参考杨萌萌、胡建华(2017)的方法,利用“张三和李四都是老师”做相应的句法测试,结果显示西宁方言主语位置的“带”也是介词,先看下面的例子:

(16) 张三带李四俩一挂是老师。

(17) 张三我想呵带李四俩一挂是老师。

(18) 张三活像带李四俩一挂是老师。

有意思的是,用“张三和李四都是老师”做测试,母语人最自然的表达是要加一个伴随标记“俩”,虽然母语人明确表示不用“俩”意思一样,但是我们采集的语料中,母语人脱口而出的说法一般都是“俩”和并列标记“带”构成一个框式结构(王双成 2012),“带”不是连词而是介词,所以西宁方言的“带”在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上也是不对称的。

二 西宁方言的并列和伴随

并列和伴随是一对“孪生兄弟”,Stassen(2000)根据260种语言的调查结果显示:并列、伴随采用相同标记的语言有103种,采用不同标记的语言131种。Stassen(2000)以是否区分两种策略为参数来划分语言类型:以不同方式使用伴随策略、并列策略(明显区分伴随、并列策略)的为“AND型语言”(AND-language);以伴随策略为唯一选择,没有并列策略(没有伴随、并列策略的区分)的为“WITH型语言”(WITH-language)。根据Stassen的标准,西宁方言属于“AND型语言”,并列、伴随采用不同标记,即并列标记用“带”,伴随标记用“俩”。例如:

(19) 张老师哥哥带兄弟哈骂给了一顿(张老师骂了哥哥和弟弟一顿)。

(20) 哥哥夜来带兄弟俩去了(哥哥昨天和弟弟去了)。

Stassen(2000)在定义“AND型语言”和“WITH型语言”时强调,纯正的“WITH型语言”很少见,大多数“WITH型语言”都有一个从伴随策略发展出并列策略的语法化过程,所以“WITH型语言”具备纯正的伴随策略以及介于伴随、并列策略之间的混合手段,西宁方言的框式伴随标记可以看作是这种混合手段,结构为“A+带+B+俩”,比如例(20)。

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约60公里的乐都方言则不同,其并列和伴随采用同一个标记“连”,比较下面的例子:

(21) 我把哥哥连兄弟骂给了一顿(我骂了哥哥和弟弟一顿)。

(22) 哥哥夜来连兄弟学里去了(哥哥昨天和弟弟去了学校)。

乐都方言并列结构的复合词同样使用标记“连”,如“阿达连阿妈”(爸爸和妈妈)、“太阳连月亮”(太阳和月亮),由此可以进一步验证乐都方言的“连”是并列连词。乐都方言并列、伴随都是采用相同的标记“连”,但是工具格采用另外一个标记“俩”,例如:

(23) 我手俩撕开了(我用手撕开了)。

从语言的区域类型关系看,青海境内汉语方言的并列、伴随和工具格关系密切,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对青海主要汉语方言中并列、伴随、工具格标记的使用情况做了统计可以很清

楚地了解这几个标记之间的关系（见表1）。

表1 青海汉语方言并列、伴随、工具格标记使用情况

语言	方言点	并列标记	伴随标记	工具格标记
汉语方言	西宁	te-	-lia	-lia
	大通	te-	-lia	-lia
	湟中	te-	-lia	-lia
	湟源	te-	-lia	-lia
	互助	te-	-lia	-lia
	乐都	lian-	lian-	-lia
	循化	lian-	lian-/la	-la
	同仁	lian-	lian-/la	-la

从表1提供的信息可知，青海的汉语方言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西宁、大通、湟中、湟源、互助。这类方言并列标记采用 te-（通常写作“带”），伴随和工具格采用相同的标记，都是后置词“lia”（即“俩”，详见后文），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也是青海方言的主要特征。

第二类：乐都、循化、同仁。这类方言工具格标记采用“lia”或“la”，并列和伴随采用相同的标记“lian”，这类方言在青海分布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青海东部，特别是和甘肃接壤的地方，有一定的区域特点。另外从调查的情况看，循化、同仁方言中伴随标记出现并行，既可以是前置词“lian”，也可以是后置词“la”，不过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后置词“la”的使用明显占优势，这种现象也正好反映了当地汉语方言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演变的路径和特点，是很值得关注的。

下面通过比较例（24）（25）来进一步了解两类方言中伴随、工具格标记同现时的共性和差异。例如：

（24）西宁方言：我头儿里带阿妈手俩撕开了（我刚才和妈妈用手撕开了）。

（25）乐都方言：我刚才连阿妈手俩撕开了（我刚才和妈妈用手撕开了）。

三 西宁方言“伴随标记>工具格标记”的语法化

吴福祥（2003）通过汉语、壮侗语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发现在 SVO 型语言普遍存在“伴随介词>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两种演变模式，体现的是 SVO 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一种演变类型，其中“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的演变模式是隐喻操作促动。

西宁方言的伴随标记“俩”也不例外，有“伴随标记>工具格标记”的语法化过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乐都方言的伴随标记为前置词 lian-（连），工具格标记则是和西宁方言相同的后置词 -lia（俩），所以乐都方言并没有走“伴随>工具”的路子，但是其工具格标记 -lia（俩）和西宁等地方言有相同的来源。

根据黄伯荣（1996:527、536、539）的材料，新疆汉语方言的伴随、工具格标记都使用

前置词“连”：

(26) 这个少年嘛，就连他母亲一同去（这个少年就和他母亲一道去）。

(27) 这个字我连钢笔写的（这个字我用钢笔写的）。

(28) 娃子连尕莲子是一搭呢长大的（尕娃子和尕莲子是一块儿长大的）。

甘肃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的并列、伴随标记也是用前置词“连”（莫超 2004:123）。例如：

(29) 你连他两该到青海去（你跟他两个到青海去）。

(30) 吃连住是一辈子的大事情（吃和住是一辈子的大事情）。

新疆、甘肃白龙江方言材料可以证明，青海乐都方言并列、伴随标记 *lian-*（连）与这些方言是同源的，而且都是典型的前置词。有意思的是，新疆的汉语方言也是和周边的阿尔泰语言有密切的接触关系，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于西宁方言的变化？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他语言中也存在“伴随格>工具格”的语法化特点，比如埃维语（Ewe）的 *kplé* “和……一起”既是伴随格前置词，也可以用于工具格（Heine & Kuteva 2002:80/85）^①：

(31) *é-yi kplé wo.* 她和你一起去。

第三人称：单数-去 和…一起 第二人称：单数：宾语

(32) *wó-tu-a βotrú kplé safui.* 门一般用钥匙打开。

第三人称：复数-开-惯常体 门 和…一起 钥匙

巴卡语（Baka）*te* “和……一起”，伴随格前置词>“用……”，工具格前置词：

(33) *ma à kɔnɔ wà te ngbala.* 我用大砍刀砍柴。

第一人称：单数 体标记 砍 柴 伴随格 大砍刀

恩巴卡马伯语（NgbakaMa’Bo）*té* “和……一起”，伴随格前置词>工具格前置词，比如（Heine & Kuteva 2002:85）：

(34) *ʔè ʔbókò nzò-kánà-ngéè ten diká.* 后来他用坚果打他妈妈的头。

后来：他 打 头-妈妈-她的 用 坚果

因布拉凯楚阿语（Imbabura）的 *-wan*，伴随格标记>工具格标记，如（Heine & Kuteva 2002:86）：

(35) *nūka waw ki-wan kawsa-ni.* 我和我的兄弟一起住。

我的 兄弟-伴随格 住-我

(36) *pamba-pi γunda-wan γapu-ni.* 我用两头牛在地里耕地。

地-在…里 两头牛-工具格 耕-我

再如多贡语（Dogon）*-le* “和…一起”，伴随格后缀>工具格后缀；土耳其语（Turkish）*ile* “和…一起”，伴随格后置词>工具格后置词；莫雷语（Moré）*né* “和…一起”，伴随格前置词>“用”，工具格前置词；拉丁语（Latin）*cum* “和…一起”，伴随格前置词>工具格前置词；匈牙利语（Hungarian）*-vel/-val* “和…一起”，标记伴随格的后缀>标记工具格的后缀；阿尔巴尼亚语（Albanian）*me* “和…一起”，伴随格前置词>工具格前置词；保加利亚语（Bulgarian）*s* “和…一起”，置词>工具格置词；奥托米语（Mezquital Otomi）*ko* “和…一起”，伴随格标记>*ko*，工具格标记；雅瓜语（Yagua）*-ta* “和…一起”，伴随格后缀>工具格后缀。

^① 例句引自 Heine & Kuteva (2002)，标注和语言名称翻译同时参考了该书中文版，下同。

“伴随>工具”甚至“伴随>工具>方式”的认知基础是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135-136) 指出 An instrument is a companion (一个工具就是一个伴随者)。因为语言隐喻实际上是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在语言中的体现，我们首先建立的是概念上将一个范畴隐喻化为另一个范畴，然后才有语言中将一个词语隐喻化为另一词语的现象 (胡壮麟 1997)。

正因为如此，典型的伴随成分是人 (person) 范畴，典型的工具成分是物 (object) 范畴，而典型的方式成分是性质 (quality) 范畴，因此，三者之间的隐喻关系可以刻画为下面的等级序列：伴随>工具>方式；这个等级序列能够有效地解释，为什么很多语言里伴随格语素可以获得工具义和方式义，但反之则不然 (吴福祥 2003)。

四 西宁方言伴随格、工具格标记“俩”的来源

为了方便比较和讨论，我们对西宁及周边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并列、伴随、工具格标记使用情况做了统计 (见表 2)，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汉语和民族语在这些标记使用方面的特点。

表 2 汉语方言和民族语并列、伴随、工具格标记使用情况

语言	方言点	并列标记	伴随标记	工具格标记
汉语方言	西宁	tɛ-	-lia	-lia
	大通	tɛ-	-lia	-lia
	湟中	tɛ-	-lia	-lia
	湟源	tɛ-	-lia	-lia
	互助	tɛ-	-lia	-lia
	乐都	lian-	lian-	-lia
	循化	lian-	lian-/la	-la
	河州	-la	-la	-la
	新疆	连-	连-	连-
混合语	五屯话	-ma	-liangə	-liangə
阿尔泰语 ^①	蒙古语	-tɛɛ	-tɛɛ/-tɛɛ	-aar/-əər/-oor/-oor
	土族语	-da	-la	-la
	保安语	gədzi	-galə	-galə
	东乡语	-dai/-dzi/-mu	-cala	-lə
	撒拉语	-ma	-la	-la(-lanə)
	康家话	-ma	-cala	-cala
藏语	书面藏语	-daŋ	-daŋ	-gis/-kjis/-gjis/-fjis/-is
	泽库	-ra	tʂoχ ya	kə
	循化	-ra	tʂoχ ya	kə

^① 根据我们的调查，民和土族语的并列标记用-ma，和撒拉语、康家语相同。孟达来 (1996) 认为东乡语的-la 以及-sla (<s+la) 中的-la，保安语的复数附加成分-la/-lə 等形式和突厥语族语言中使用广泛的复数附加成分-lar/-ler 颇为相似。

从目前西北地区的语言背景看,历史上和当下同汉语接触的语言有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蒙古语、土族语、撒拉语等)和藏语方言(主要为安多方言)。从表2可以看到,藏语作为施格语言,书面藏语的施格和工具格采用相同的标记-gis/-kjis/-gjis/-fjis/-is(是一个标记的五个不同变体),安多藏语口语都是ka;书面藏语并列、伴随采用同一个标记-dan;安多藏语口语并列标记为-ra,伴随标记为tsoχ ya^①。所以从语音形式看,西宁及周边汉语方言的并列、伴随和工具格标记同藏语差别明显,而同阿尔泰语系语言关系密切。比如西宁汉语方言的并列标记“带”实际读音为te,比较蒙古语的-tεε、土族语-da、东乡语-dai,不论是语音形式,还是功能,二者的联系无法忽视。

青海境内的汉语方言除了乐都等少数地方伴随和工具格采用不同的标记外,大部分方言伴随和工具格采用相同的标记-lia或-la,使用-la的方言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青海省的循化、同仁、尖扎及邻近的甘肃临夏等地,这个-la的来源,我们认为虽然不排除lia>la的可能性,但是直接借用周边的阿尔泰语-la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比较土族语的-la、保安语的-galə、东乡语的-lə、撒拉语的-la、康家语的-gala。

陈乃雄(1987:121)指出保安语的凭-联合格标记gala来自数词“俩”的语法化;哈斯巴特尔(2001)通过蒙古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之间的比较,指出蒙古语族语言中,联合格、工具格、集合数、复数之间存在采用同一种词缀形式的现象,认为蒙古语等语言中的集合数词缀-yula、-güle是由早期的qoyar“二”+ -la(<-lan)“集合数词缀”的*qoyarlan“两个一起”经历了一系列语音缩减和脱落演变而来的,如土族语的-la同时表达集合数、工具格和联合格三种语法意义。

据我们的调查,青海互助县、民和县的土族语伴随格通常使用-gulə/-gula而非-la^②,母语人明确表示-gulə/-gula就是“两个”的意思;但是两地土族语工具格使用的-la^③,母语人已经无法和-gulə/-gula建立联系,显然“伴随格”>“工具格”的语法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工具格标记-la的语法化程度高,伴随格标记-gulə/-gula的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

西宁及周边汉语方言的伴随、工具格标记-lia即汉语的“俩”,“俩”来自“两个”的合音以及语法化(赵元任 1927、彭楚南 1957、徐思益 1958、高名凯 1986、太田辰夫 1987、江蓝生 1994、冯春田 2002、孔祥卿 2005、彭晓晖 储泽祥 2008、荆亚玲 汪化云 2016)。这在五屯话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五屯话工具格标记为-liangə,其实就是“两个”。例如陈乃雄(1982, 1989)^④:

(37) 'nəteikə çan'tcha-liangə tɕə'tɕɿ wan'ləntɕɿ. 我们用木头制作桌子。
我们 木头(用-凭借格) 桌子 作

根据我们的调查,五屯话的伴随同样使用-liangə^⑤:

^① 青海南部的安多藏语并列标记为-ta,施格、伴随、工具格标记和青海北部方言基本相同。tsoχ ya义为“伴随”、“陪伴”,还不是典型的功能词,没有完全虚化。

^② 表格中的-la来自《土族语简志》。

^③ 哈斯巴特尔(2001)记录了民和土族语 mutu-gələbaga~mutu-labaca(用木头打)的用法,可能调查点不同,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类似的用法。

^④ 五屯话的凭借格标记在两篇论文中写法不同:《五屯话初探》(1982)为-liangə,《五屯话的动词形态》(1989)一文为-liangə。根据我们的核对,应该是-liangə,此处按原文引用。

^⑤ 发音人 Blo bzang tshe brtan, 30岁,男,本科毕业,青海省同仁县五屯上庄人。

- (38) a'ba tsu a'na-liangə 'ççiquəlio. 爸爸昨天和妈妈去了。
爸爸 昨天 妈妈-伴随 去了

发音人还给我们提供了例(39)的这种说法。我们在互助、民和土族语的调查中,发现这样的说法也很普遍,即表示并列的连词-da/-ma和表示“两个”义的-gulə/-gula前后配合使用。例如:

- (39) tsu a'ba-da a'na-liangə 'ççiquəlio. 昨天爸爸和妈妈去了。
昨天 爸爸-并列 妈妈-伴随 去了

类似的说法在西宁方言中也有,整个句法结构如出一辙,比较例(20)。当然,西宁方言的伴随格标记“俩”已经高度语法化,虽然在伴随者是一个“人”的时候还可以理解为“两个”,但是有多个伴随者的时候,显然已经不能解释为“两个”了,例如:

- (40) 我小张、小刘、小王俩北京去了(我和小张、小刘、小王去了北京)。

工具格标记“俩”的语法化程度更高,“我刀刀俩”(我用刀子)这样的结构中,母语人已经无法将“俩”和“两个”联系起来,更不要说是多个工具连用的时候。例如:

- (41) 我手钳子、锤锤、改锥、扳子俩修了(我用钳子、锤子、螺丝刀、扳手修了)。

需要说明的是,西宁等地方言的“俩”并不是单个“二”的语法化(西宁方言的“二”读音为 ϵ^{35} ,语音形式相差甚远),而是“两个”先合音为“俩”,再逐步从伴随标记类推到工具格标记,这一点结合五电话看得非常清楚;西宁方言“俩”的这种演变我们认为当地原本操阿尔泰语的少数民族在转用汉语的过程中,句法上直接“拷贝”母语的结果。当然,“俩”所处的句法位置为这种“拷贝”提供了便利,这在方位词的语法化中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即“俩”所处的位置和SOV语言的后置词位置“完美匹配”,然后为功能的“拷贝”和“强化”提供了便利(王双成 2020)。

Heine & Kuteva (2002)通过跨语言考察发现,名词性成分连接件的语法化来源包括伴随标记、原义为ALSO或TOO等的副词、表示TWO的数词或双数标记、表示BOTH或ALL的量化词等。

阿利亚瓦拉语(Aliyawarra)的数词athirra“二”先语法化为双数标记,然后进一步演变为协同格标记-athirra“和”、“与……一起”;瓦伊语(Vai)的数词féra“二”语法化为连接两个名词短语的小品词“与……一起”、“和”,如(Heine & Kuteva 2002:303):

- (42) wu féra wu bənu. 你和你的朋友们。
第二人称:复数 和……一起 第二人称:复数:领属格 朋友

再如塞舌尔的克里奥尔法语(Seychelles CF)的基数词de“二”>在特定语境中连接两个参与者的标记,如(Heine & Kuteva 2002:304):

- (43) nu de Gabriel nu ava ale. Gabriel和我将会去。
我们 和 Gabrielle 我们 将来时 去

另外,西逊语(West Xun)的基数词tsa“二”>sá,连接名词短语的小品词,这和科伊语(Koxe)的双数标记-tca都有联系,所以数词“二”最常见的语法化过程很可能是“二>双数标记>名词短语-和”(Heine & Kuteva 2002:303-304)。

五 结 语

青海是个多民族地区，使用汉语、藏语、阿尔泰语的民族在这里长期接触，相互影响，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和语言关系，有些接触和影响来自阿尔泰语，有些来自藏语（王双成 2016）。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青海河湟地区的汉语方言同周边的阿尔泰语言的并列、伴随的形式和语义类型，特别是并列标记、伴随标记、工具格标记的使用特点有很多共性，形成了一个区域类型，比如西宁方言的并列标记 *te-*（带）和土族语、蒙古语、东乡语、撒拉语等语言并列标记的语音形式非常接近；特别是伴随标记 *-lia*（俩）来自“两个”的合音和语法化，“俩”进一步语法化为工具格标记的特点都和阿尔泰语非常类似，而和同样是 SOV 语言的藏语差别较为明显，仅从这一点看，西宁及周边汉语方言同阿尔泰语言的接触关系更为紧密和深刻。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新疆的汉语方言也是长期处在阿尔泰语言的包围下，却没有发生和西宁方言相同的演变，其中的原因也是值得深究的。

我们认为甘青地区的语言区域类型一方面是因为语言接触，但更多的原因是早期语言转用并逐渐扩散形成的，因为母语不同，所以在转用汉语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层次”。

参考文献

- [1] 陈乃雄. 1982. 《五屯话初探》，《民族语文》第 1 期。
- [2] 陈乃雄. 1987. 《保安语和蒙古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3] 陈乃雄. 1989. 《五屯话的动词形态》，《民族语文》第 6 期。
- [4] 冯春田. 2002. 《数量结构合音词“俩”、“仨”的几个问题》，《语言研究》第 2 期。
- [5] 高名凯. 1986. 《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哈斯巴特尔. 2001. 《关于蒙古语集合数词缀 *-yula*, *-güle* 的来源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第 2 期。
- [7] 胡壮麟. 1997. 《语言·认知·隐喻》，《现代外语》第 4 期。
- [8] 黄伯荣.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 [9] 江蓝生. 1994. 《〈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上），《语文研究》第 4 期。
- [10] 荆亚玲、汪化云. 2016. 《双数标记“俩”的语法化》，《古汉语研究》第 2 期。
- [11] 孔祥卿. 2005. 《河北辛集话的合音现象与合音词——兼谈普通话合音词“俩”“仨”“别”的来源》，《南开语言学刊》第 1 期。
- [12]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3] 马清华. 2004. 《并列结构的自组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4] 孟达来. 1996. 《论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复数附加成分》，《满语研究》第 2 期。
- [15] 莫 超. 2004. 《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6] 彭楚南. 1957. 《语法范畴（上）——语言学讲话之三》，《中国语文》第 5 期。
- [17] 彭晓晖、储泽祥. 2008. 《湖南祁东话表示双数的“两个”》，《汉语学报》第 2 期。
- [18]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 王双成. 2012. 《西宁方言的介词类型》，《中国语文》第 5 期。
- [20] 王双成. 2016. 《藏语名词的指称及其对周边语言的影响》，《民族语文》第 3 期。
- [21] 王双成. 2020. 《接触与共性：西宁方言方位词的语法化》，《语言科学》第 2 期。

- [22] 吴福祥. 2003.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中国语文》第1期.
- [23] 徐思益. 1958. 《也谈“概数”——并试论现代汉语“数”的语法范畴》,《语文知识》第4期.
- [24] 杨萌萌、胡建华. 2017. 《何以并列?——跨语言视角下的汉语并列难题》,《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第5期.
- [25] 玉柱. 1988. 《关于连词和介词的区分问题》,《汉语学习》第6期.
- [26] 赵元任. 1927. 《“俩”“仨”“四呃”“八阿”》,《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 [27]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8]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12.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洪波、谷峰注释,洪波、吴福祥校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9]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0] Haspelmath, M. 2004.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An overview. In M. Haspelmath (ed.).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pp. 3-3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31] Haspelmath, M. 2005. Nominal and verbal conjunction. In S. M. Dryer, M. Haspelmath, D. Gil & B. Comrie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pp. 262-265.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2] Lakoff, George & Johnson Mark.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3] Stassen, L. 2000. AND-languages and WITH-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4: 1-54.

Language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in Xining Dialect:

with a Discussion on Sources of the Comitative and Instrumental Marker *lia* 俩

WANG Shuangcheng

[Abstract] Coordination is a common coding device in languages. In terms of forms and semantic types, coordination in Xining dialect shares commonalities with other Chinese dialects and has its own idiosyncratic features at the same time.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ordination and comitative construc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ordinative and comitative markers, as well as the features and sources of the instrumental case marker, a further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omitative marke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anguage contact with surrounding Altaic languages. The comitative and instrumental case marker *lia* 俩 evolves from the Chinese *liangge* 两个, but their us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re impacted by the Altaic languages, which bear regional features resulted from long-standing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Xining dialect of Chinese coordinative and comitative constructions instrumental case grammaticalization of *lia* 俩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 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本文责编 普忠良】